

情感参与: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实践理路

——以“草原情结”在内蒙古混合语言家庭中的传播为例

乌日罕

摘要:跨语言情境下的情感参与对文化意义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研究聚焦情感参与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机理,以“草原情结”在内蒙古自治区混合语言家庭中的传播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考察混合语言家庭成员间的跨语言交往。研究发现:基于生活事件、媒介实践的跨语言情感参与是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重要途径。由于情感包含着关于文化的认知和文化中的价值,这让情感参与不仅适用于家庭,也适用于更广泛的跨语言交往情境。

关键词:情感参与;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草原情结;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5-012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860007)

情感实践是使人产生特定情感体验的行为,情感参与则是指通过参与或接近他人的情感实践来感受、认知甚至共享相关情感。对基于特定文化的情感而言,对该文化意义的认知和理解是唤起和支撑相应情感的关键要素。感知和理解这种情感,了解其由来,是理解和领会相应文化意义的重要路径和方式。另外,情感的传播,对情感的感知和理解经常能跨越语言的障碍。经由情感交流,不同语言的使用者能够找到一些促进理解的非语言路径。由此,关注跨语言情境下的情感参与对跨文化传播的意义,解析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能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关怀。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庭由使用不同语言的成员构成,部分家庭成员不会其他成员的语言,在语言交流上存在障碍。如果以语言为标准,这类家庭可以被称为混合语言家庭。对于研究文化意义的跨语言传播和理解而言,这类家庭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家庭保证了其家庭成员跨语言交流的质与量。对于他们而言,跨语言交往既是其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其日常交流的前提,跨语言交流需要一定的质,才能应对频繁的日常交往。第二,相较而言,家庭成员之间拥有更多的善意和信任,有更频繁、更深入的互动,这为成员间的情感参与提供了条件和场景。那么,在家庭中,情感参与对家庭成员间的跨语言理解,尤其是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意义,有何作用和意义?有何具有共性的实践路径,其背后的理论机理如何?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混合语言家庭: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典型情境

本文的混合语言家庭,指部分家庭成员不会或不能很好地使用其他家庭成员主要使用的语言,家庭成员间的互动需要使用多种语言;而非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多种语言,且至少通晓彼此使用的一种语言。混合语言家庭体现了霍米·巴巴“混杂性”意义上的“互动和相涵的动态关系”,是一种可以容纳异质语言经验的“间性空间”,其容纳的不同文化组成了丰富且复杂的杂合文化。^[1]这类家庭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基于人口迁移、现代性与城市化等因素。从历史维度上看,内蒙古地区的混合

语言家庭古已有之,基于现代化、城市化以及相关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变迁,近现代以来其形成和发展又有了一些特点。

内蒙古的混合语言家庭主要源于族际通婚和学校教育的影响。通婚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组成家庭,家庭内部可能会有使用蒙古语^①的成员和使用其他语言的成员。学校教育的影响主要是家庭中的子女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接受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要媒介的教育,子女主要使用的语言与部分长辈不同,进而形成混合语言家庭。家庭成员社会化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语言^[2]的不同,导致其语言经验产生差异。语言经验不同的两类成员间形成跨语言交流,另外,还存在家庭成员间同时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沟通的跨语言交流。由此,会伴生一些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与不便,如交流的深度、广度和频率受影响,意义传递的准确性受影响,交流中形成生冷感、距离感等。然而,由于家庭生活和家庭交往的需要,语言的差异不会阻断交往,存在多种跨语言交流的方式。家庭关系、家庭情境为跨语言交流的持续性和深入性提供了保证与前提,方便研究者集中地、深入地、密集地观察跨语言交流实践。本文以此为分析案例,并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两种方法展开研究。

研究采用目标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内蒙古 13 位来自不同混合语言核心家庭的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其中 12 位访谈对象使用或主要使用普通话,1 位访谈对象能兼说普通话和蒙古语,访谈的目的在于从内部视角理解涉及其中的跨语言互动现象,访谈对象简况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简况表

序号	性别	年龄	访谈对象类型	访谈时间
1	男	33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14
2	女	26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19
3	女	27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20
4	女	22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20
5	女	36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26
6	男	42	使用普通话	2021-01-28
7	男	31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2-10
8	女	36	兼用普通话和蒙古语	2021-04-17
9	女	32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11-16
10	男	33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12-16
11	女	31	使用普通话	2021-12-20
12	女	34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2-01-04
13	女	27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4-02-28

参与式观察分两个阶段。首先,基于特定田野点,深入部分家庭开展观察与记录。笔者选定 D 嘎查^②作为预调研点,重点走访了当地的 8 户人家,获得了初步的田野数据。D 嘎查位于内蒙古东部,蒙古族人口占比 99%,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从该地迁出的人口,部分组成了混合语言家庭。这样的环境为综合观察混合语言家庭中的跨语言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在 T 和 H 两个地区^③展开,对 6 个混合语言城镇家庭的日常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其中,基于族际通婚和学校教育途径形成的混合语言家庭各占一半。

①蒙古语中存在多种语言变体即方言,文中的“蒙古语”指对应于具体方言区的某类蒙古语变体。

②嘎查为当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相当于行政村。

③T 和 H 分别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中部的两座人口规模在 100 万以上的城市,蒙古族人口在其总人口中均占一定比例。

二、“草原情结”:对传统游牧文化的情感依恋

在调研展开的区域,蒙古族人口比重高,蒙古语在家庭成员的交往中使用频繁,是家庭交流的主要语境。不使用或不主要使用蒙古语的家庭成员,面临语言交流的障碍,跨语言沟通的情况在其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牧业是内蒙古的传统支柱产业,调研的D嘎查更是以牧业为主,因此,基于游牧生活的“草原情结”^[3]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情感寄托,表达了以游牧生活为核心,以草原为象征的信念、价值和文化,承载了对传统游牧生活的文化眷恋、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其中的文化意义具有地方性默会知识的属性,是其文化生活的重要拼图和背景,并具体体现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情感交往中。

对于当地的混合语言家庭中不使用或不主要使用蒙古语的家庭成员而言,理解“草原情结”这种复杂的情感及其承载的文化意义,有助于其共享和理解其家庭所处的背景,及其关于家的观念、习俗与习惯等,即“关于家的文化”或“家文化”^[4]。这种共享和理解是家庭成员相互尊重的重要条件,有利于成员间的情感交往和联结。对于不再过游牧生活,已经迁出草原的居民而言,与保有游牧生活经验和记忆的家庭成员的交往与共同生活,是感知“草原情结”的重要途径,是获悉游牧文化意义的中介,是理解家人情感家园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其与作为“地方”的草原的纽带。

在“草原情结”中,“草原”不仅是空间,更是“地方”^[5]。“地方”是人与空间交流后的经验认知。在蒙古族的传统认知中,作为家乡的“地方”是由山水草地连接起的熟悉空间,其中蕴含着他们对作为家乡的山水草地的意义认知和价值理解。在蒙古语中,对“家乡”即 *nūtag* 一词的表达,往往伴随着“广阔”“无边”这样的修饰词,它所指向的是一定范围内的开放空间。与此同时,其对空间的组织也遵循着开放原则。作为“家”的传统居所 *gər*——蒙古包,是一个流动空间,意味着逐水草而生,并非固定于特定地点。蒙古包的圆形结构,形成对空间资源的均匀分配,营造出面对面交流的场景。作为文化特征,其关于“地方”的想象不束缚于有固定边界的空间。所以,“草原”包含了关于传统游牧生活、游牧文化和游牧者家园与家庭的信念与想象,游牧是迁移的、流动的、开放的和不在于固定边界之中的观念和记忆,体现出其源自传统游牧生活的独特家文化。

“草原”表明了意识和情感指向的对象,“情结”则是意识和情感指向对象时的具体状态。首先,这里的情结是一种肯定性情感,承载着对“草原”的依恋,这种情感包含着对“草原”所象征的游牧文化的认知和价值上的肯定。其次,虽然这种依恋指向观念层面的文化,但其触发依赖具体而微的符号、器物、习俗仪式、场景、实践或事件,“具体”是建立情感与文化之间联系的中间环节。再次,“情结”还意味着人与所依恋之物、之事、之境存在距离,或它们的缺席,以至于常常让远离传统游牧生活,远离了草原的人对其产生一种绵延的依恋之情,而情结的触发让缺席之人思念“草原”,即再次嵌入作为“地方”的草原。这里体现了现代性导致的“地方”与“空间”的分化,支撑现代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人从草原“吸入”城市,但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与工业生产配套的钟表时间以及人际间的契约关系,让“地方”成了无差别的地点,在某种意义上无法完全安放拥有游牧文化记忆者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寄托。“草原”仍旧散发着魅力,吸引着迁居都市的居民游草原、访草原和回草原,与草原上的亲友密切交往。“草原”仍是众多缺席者、远离者心中的一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及社群间交流中^[7],家乡作为对“地方”的熟悉感得以与城市形成某种“缺场”式的连接,通过“对远距离事件的近距离表述”实现了“对熟悉性的再把握”^[6]。

如此,可以看出“草原情结”的缘起、触发和传播,不仅需要语言符号,更需要人对相关情境的参与,离不开与分享着传统游牧文化的人的密切交往,乃至共同生活、共同实践。这让“草原情结”的跨语言传播得以可能。

三、在情感参与中跨语言体认“草原情结”的四种路径

体认“草原情结”是其传播的重要环节,由于“草原情结”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情感,而非一般意

义上的知识或信念,其一方面需要理性的认知,另一方面也需要具身的体验与感悟,故称之为体认。体认包含着对游牧文化中各种意义的理解,也表达了自身的触动与感性的激发。由于需要体验,情感参与正好可以绕过语言上的不便,进入“草原情结”发生的现场。

在家庭交流的情境中,家庭成员会经历诸多生活事件,包括家庭聚会、节庆仪式等,这些是“草原情结”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呈现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媒介也能提供在家庭中感知“草原情结”的特殊形式。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有多种途径展开互动,进行情感参与,产生领会“草原情结”的契机。通过考察发现,围绕“草原情结”,作为研究案例的混合语言家庭中至少存在如下四种情感参与路径。

(一)歌中见情:在歌声中感知

唱歌是蒙古族家庭聚会中重要的互动环节,它不仅是家庭聚会中的主要互动形式,也构成聚会的核心事件,承载和体现了众多传统游牧文化元素。其中通常涉及互动起始的时间、献歌次序规则、歌曲的选择、歌曲的合唱等具体内容。经过现场观察可知,聚会中的歌曲一般涉及多种类型,包括流传时间较长的蒙古语民歌、新创作的蒙古语歌曲、蒙古语红歌、普通话草原歌曲等。大家会在气氛开始热闹起来后开始唱。第一个唱的往往是呼声最高或最先激动的人。唱完第一首歌后,大家会推举下一位唱歌者,有意愿唱下一首歌的人也会自告奋勇地接着唱。歌曲的选择,因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往往都会依照当时的氛围选择主题适宜的歌曲,同时,人们也会基于众人的反馈来选择歌曲。若是选择了符合大家心声的歌曲,会引发大家的大合唱,气氛就会愈发热烈。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这样的互动常会推动情感参与。

我觉得聚会就是一个场合嘛,听不懂就听不懂呗,大家开心就行。(11号受访者)

可见,语言和经验的差异会带来成员间感受的差异。有的家庭成员可能只能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感受聚会的氛围和热情,而缺乏代入感。与之相对,如果选择主动参与,融入互动,会增加体验和感触,甚至带来一些参与的乐趣。当进行到歌曲献唱环节时,从长辈到晚辈几乎每位成员者都会被提名或轮到唱歌。此时,当意识到唱蒙古语歌曲更符合聚会氛围或听众期许时,不主要使用蒙古语的家庭成员在歌曲选择方面会感到一些局限。在一次家庭聚会场合中,笔者观察到,2号受访者特地选了一首歌唱母亲的蒙古语歌曲,向各位亲友献唱。然而,对于未掌握蒙古文的她而言,记住歌词实属不易,她通过按读音逐字拼写的办法来记忆。在聚会现场,她找了身边具有蒙古语读写能力的同辈一起合唱,并借助一款能显示蒙古语歌词的音乐播放应用来提示歌词。^①

事实上,对于唱歌这种在聚会情境中的常态性表达和交流方式,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聚会上唱歌是特别普通的事儿,一桌人坐在一起唱上几首歌感觉可随意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唱了。(7号受访者)

聚会时你会感觉,吃着吃着,喝着喝着,就到了唱歌的流程,桌上就唱开了。他家亲戚音乐感觉非常好,歌声都是很动听的,会唱那种半长调式的音调,也会马头琴啊,呼麦这种。(5号受访者)

从歌声中,家庭成员有机会亲身接触和领会家人所流露的“草原情结”。

他们一般唱的都是关于母亲或者父亲的歌。他们在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爸他们那一辈的会热泪盈眶,非常感动,我就会问他们唱的是什么意思。一首歌唱完之后,我爸他们也会解释歌曲的意义。饭桌上可能不止我一个,我妈她也听不懂,他也会跟我们说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感。(3号受访者)

在互动过程中,身份和经历会影响情感参与的程度。

像我家人他们都知道我不会说蒙古语,但是我能给他整出来一首蒙古语歌,以至于在座的所有人都惊呆,就是这种感觉,实际唱的什么(指歌词表达的具体含义)我很少在意。在聚会中,

^①对于研究数据,本文主要采用基于备忘录写作的主题分析方法。本段取自分析备忘录90,于2022年1月21日编写。2号受访者是本案例中的观察对象。

他(指其丈夫,使用普通话)只会唱跟草原有关的歌,一个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个是《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但他没有为参与唱歌活动专门去学蒙古语,因为这对他说来说难度太高了。(9号受访者)

基于唱歌的互动形式,家庭成员能够感受“草原情结”,进行情感参与。从代际迁居的角度,唱歌成为家庭成员相遇和关联于作为“地方”的草原的过程。由此可见,在基于城市情境建立起的混合语言家庭环境中,不同文化背景、使用不同语言的亲属间展开的家庭情感交流活动,具有某种与作为整体的地方性社区内成员展开意义交流的“彼此相遇”的属性。

(二)具身识情:在习俗中体验

家庭环境为背景异质的家庭成员提供了体验不同文化习俗的机会与可能,创造了观念交流与融合的互动场域,这样的体验常常是具身的,能够带来成员间跨语言的意义体认。穿蒙古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蒙古族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蒙古袍更多地出现在各类仪式性场合,如婚礼、寿宴等。对蒙汉通婚家庭中的汉族配偶而言,穿蒙古袍的经历通常意味着一次新鲜的文化体验。一般情况下,在配偶的家乡举办婚宴时,他们有机会或需要穿蒙古袍。此外,在春节家庭聚餐、参加亲友婚礼或其他场合亦有穿着各类日常款的蒙古袍的机会。

她(指其妻子,汉族)也挺喜欢蒙古袍的,给孩子也专门做了一身蒙古袍。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穿着蒙古袍的情况不多,它慢慢成了一种正装,像礼服一样。所以,她还挺愿意穿的,之前参加孩子学校的年终活动时还穿过蒙古袍。(10号受访者)

可见,对于女性而言,蒙古袍具备了礼服的功能,同时更能展现个体的审美风格,而家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样的审美品味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体验,甚至文化想象。

我对蒙古袍还是比较喜爱的,喜欢穿蒙古袍,会比较认同这种审美,觉得它可能是一种文化象征或标志。有时候会在家里聊关于蒙古袍的话题,比如某件衣服(蒙古袍)的做工,为参加什么仪式做的,怎么穿好看,或者谁做的,颜色谁挑的这些。(4号受访者)

我对婚礼的想象是,希望朋友们都穿着蒙古袍来参加我的婚礼。(12号受访者)

事实上,人们对服饰风格的偏好和追求会通过其社会网络获得传播,并由此形成一定的时尚潮流,穿蒙古袍便体现了这样的一种流行潮流。同时,这种潮流的热度在不同地区会有所差异,亦会在地区间的沟通与互动中形成相互的影响与效仿。而且,就内蒙古而言,各地区的蒙古族服饰有所差别,穿着方面亦有所讲究。这说明,文化的体验既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知过程,也具有时代性的传播脉络,沟通和交流是其基础。

(三)以礼传情:在仪式中运思

在家庭中,节庆指向私人性的节日、庆典,如寿宴、满月宴、婚宴等,涉及仪式的设置与设计,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成员在交流和参与中,会调适自己的观念,并进行个性化的实践与运用。

那年我爸妈61岁,我提出想给父母过寿,他(指其丈夫,汉族)就直接说:“过生日嘛,有什么。”我说:“不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没有重视。我跟他说:“对于蒙古族而言,61岁以后,岁数越大,寿宴(指本命年寿宴)就要办得越大。”那时候他不认同我,我也不理解他。后来才明白,其实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他没听说过给老人办寿宴。磨合多年后,他现在特别认同我这个观念,包括婚丧嫁娶的礼俗等。(8号受访者)

在酒店举办私人节庆典礼成为当下的潮流,承继文化传统的现代节庆空间成为仪式生产的情境要素。城市酒店是特定的消费空间,也是一种文化景观。在庆典互动场合,家庭及个人不仅扮演了场所消费主体的角色,亦成为仪式的生产参与主体。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而言,他们有机会在行为意义上直接参与甚至组织这样的庆典活动,形成对“草原情结”更为深入地参与。从参与者文化意义表达的能动性上,这样的实践近似或等同于充分参与。例如,作为组织者的汉族女婿6号受访者选择一家蒙古文化主题酒店,以蒙古族传统的仪式为女儿举办了满月宴。

主要考虑到爱人、女儿,以及蒙古族亲友的体验与需求,我就想用蒙古族的仪式。整个仪式,包括主持人、歌手等都是我安排的,我觉得这种仪式很好。身边的朋友早已对宴会“无感”,但冷不丁见到蒙古族的仪式让大家眼前一亮,觉得挺好,与众不同。就我媳妇的家人而言,他们感觉到我对于媳妇的重视;对于我们的亲友团(汉族)来说,觉得活动与形式很新,他们之前没见过。双方的期待都达到了,两全其美。(6号受访者)

这场庆典仪式表达展现了文化,传达了丈夫对妻子的情意与重视,还向不了解蒙古族风俗的亲友展演了对其相对陌生的礼俗仪式。展现文化不是6号受访者举办仪式的主要目的,但其对仪式的运用达到了多元的效果,拉近了原本陌生的文化和情感。

(四)以媒通情:在媒介交往中共鸣

在家庭交往中,媒介提供了一些间接的情感参与路径。一方面,基于家庭成员的媒介使用,一些承载和表达“草原情结”的媒介内容有机会在混合语言家庭中传播。不同代际的、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常会同时接触相关媒介内容。以下取自田野笔记的一段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于家庭空间的代际媒介接触情况:

J告诉我,她们家的电视盒可以收看内蒙古电视台的两个蒙古语频道,分别是蒙古语卫视频道和蒙古语文化频道,有时第九频道也会播放蒙古语节目。由于语言原因,她和老伴主要看蒙古语频道,普通话频道只能听个一知半解。她们觉得蒙古语频道的节目办得比原来更好,喜欢看译制为蒙古语的电视剧。只要是蒙古语频道,演的什么都可以(看),尤其是电视剧,如果剧情吸引人,就更着急看了。她老伴还爱看博克比赛、唱歌比拼节目,因为他自己也喜欢演奏四胡之类的乐器。她说孙辈如果不玩手机的话,尤其是小孙女,就会跟他们一起看蒙古语电视剧。^①通常,房间会划定电视和广播传播的空间,影响家庭成员接触它们的状态,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常在同一房间(空间)中看电视或听广播,这促成了相关内容在共同接收者之间的传播,让围绕媒介内容的交流互动成为可能。

家里,我和姥姥姥爷住一屋,我们这屋就听蒙古语的广播和磁带,主要是乌力格尔。^②小时候家里就一台电视,父母会习惯性地打开蒙古语台看一看,我就跟着看,看到电视里播的内容,父亲会跟我解释、分析它背后的文化意义,会说:“你看,你知道他为啥那样做吗?那是因为草原上会怎样怎样。”(1号受访者)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使用带来了家庭成员的云端相聚、跨屏共情的现象。对于混合语言家庭而言,云端相聚一般指在家庭微信群里的跨屏互动。家庭聚会场合是引发这类跨屏互动行为的重要场景,聚会时常会出现特定亲友缺席的情况;对于那些跟随子女漂泊异乡,渴望同亲友聚会的年长者而言,这种缺席往往伴随着遗憾。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聚会时的图文等“实况信息”,有效地实现了情感在场和情感共鸣。对此,笔者观察到如下互动过程:在外打拼的小辈及帮其照看孩子的长辈,在家族群中看到大家以视频或图片形式直播的聚会实况,尤其是接续唱歌的热烈场面后,开始忍不住地通过录制即时视频参与其中。小辈发出的是问候视频,长辈则发出两段边包饺子边唱歌的视频。后一段唱歌视频又被播放于正在一同就餐的众人间,得到在场众人的热烈回应。这种交流反馈,以歌曲为媒介或形式,构成了特殊的“跨屏互动”式献歌。^③

借助媒介,一些关于家庭成员“草原情结”的感受和理解应运而生。正如,在看到家族群中即时分享的聚会场景后,汉族女婿Y发出“想去内蒙古了”的感叹。^④可见,以家庭为纽带,一些不具备草原生活经历的家庭成员也能将关于“家”的寄托安放在作为“地方”的草原之上,产生一些关于家乡

^①摘自笔者在D嘎查考察时的田野笔记,2018年8月4日记录。此段记录了笔者到J(牧民,女,65岁左右)家拜访时所观察到的情况。

^②此处的蒙古语台和蒙古语的广播分别指内蒙古电视台蒙古语频道和内蒙古广播电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则是指一种蒙古语的曲艺说书形式,通常结合四胡伴奏进行说唱表演。

^③取自分析备忘录91,2022年10月2日编写。

^④取自分析备忘录93,2022年10月2日编写。

的情感共鸣。此时,媒介不仅是信息接触平台,它也是家庭成员理解彼此不同文化体验的途径,帮助家庭成员超越语言的差异,实现对彼此情感的体认。

大概在我十岁左右,记得旁边是条小溪,有牛羊,那种很悠闲自由的生活记忆就停留在那个阶段。

这是13号受访者儿时记忆中的,回到姥姥家的惬意场景,这些过往隐约牵动着她关于草原的情感。通过情感参与,“家”成为承载家庭成员情感的“时空体”(Chronotope)^[8],以“草原情结”为线索,跨语言地连接了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构筑起他们共同的情感家园。

综上,在以上四种家庭情境中的情感参与路径中,前三类路径在参与深度上具有逐步深入的趋势,第四种路径的参与深度受到媒介特性、内容接近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参与的程度影响着参与者对“草原情结”的体认,关系着背后文化意义的传播。那么这种基于家庭关系和家庭情境的情感参与对于文化意义的跨语言传播的积极作用是否具有普遍性?这需要深入实践背后的逻辑。

四、情感参与促进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逻辑

上述家庭情境中的情感参与实践,对文化意义的跨语言传播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借鉴价值?其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家庭成员间的信任和友善为相关的情感参与带来了便利,家庭成员间的密切交往保证了情感参与的频度与深度,但在家庭之外,仍然有很多存在情感参与支撑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情境。例如,多语言的工作共同体、多语言的任务共同体等实践共同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9],跨国的旅行、留学等场景,新媒体的普及更是创造了众多网络情感参与的场景、渠道和机会。在家庭之外,仍然有大量的情感参与途径。

第二,文化意义不仅包含知识性内容,还包含价值性内容,知识性内容主要依赖认知、理解和理性,同时也会在情感中得以体现,情感也具有认知属性^[10],包含着一些默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对价值的把握离不开对情感的深入,价值凝结在知识中、文本中和文字中,也凝结在情感及其模式中。爱恨的缘由、塑造情感的因素、表达与传播情感的方式都包含着文化的价值偏向和对意义的理解。文中,家庭成员间的跨语言互动指向他们对草原的依恋,随着互动的深入,“边缘性参与”逐步接近“充分参与”^[11]，“草原情结”所蕴含的价值及地方性默会知识也随之彰显。

第三,对情感的把握仅依靠外在的、冷静的观察还不够,还需要走近情感,甚至投身其中,增加对相关情感的切身体会。正如无法在岸上学会游泳,缺乏对情感的体验和经历,会妨碍对情感的理解,因此情感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跨语言交流的情境中,由于无法借助未被交流双方所共享的语言进行沟通,就更要依赖日常生活中的参与来改变理解。“草原情结”是基于个体地方经验而形成的复杂情感。参与那些具有浓郁“草原情结”的家庭的情感实践,并建立情感联系,有助于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在情感交往中理解情感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以不同路径进行情感参与的过程,指向作为感知主体的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与连接。其中的感知经验具有文化属性,因而,在感知主体间互动意义上产生的情感参与体现的是文化意义的主体间传播。由此可见,“草原情结”的跨语言传播是一种基于“家”的地域性及社会性空间所建立的,多重感官参与其中的传播实践,展现了身体和情感的沟通力量。^[12]

总体而言,文章聚焦本土传播经验,分析“草原情结”的跨语言传播,挖掘情感参与在其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和积极意义;提炼了“情感参与”的内涵,在跨语言传播的案例中发掘了具身体认,在仪式中运思,以及在媒介互动中创造共鸣等情感参与的实践路径;阐释了具有显著地方性的“草原情结”得以生成的条件,及其所包含的重要文化意义。与此同时,文章提示了情感的认知属性,及其中的价值内涵,阐述了情感参与不仅适用于家庭情境中的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还具有更为普遍的参考价值 and 意义。但由于家庭关系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差异,情感参与的实践路径也有其应用的

局限和前提,对其实践路径的探讨还有赖于更多经验研究的积累和补充。

参考文献:

- [1] 熊伟,王伟.理想与现实:论文化间性的内在矛盾.江西社会学,2023,6:180-188+208.
- [2] C. Kramsch. Preview Article: The Multilingual Subj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6, 16(1): 97-110.
- [3] 麻国庆.游牧民族的社会转型与草原生态——张昆著《根在草原:东乌珠穆沁旗定居牧民的生计选择与草原情结》序言.青海民族研究,2018,4:26-29.
- [4] 孙向晨.家:中国文化最切近的当代形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5:116-123.
- [5]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10.
- [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3-124.
- [7]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
- [8] 严小香,谢龙新.卡西尔“语言时空体”的形式特征和价值内涵.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55-64.
- [9] 埃蒂纳·温格.实践共同体:学习、意义和身份.李茂荣,欧阳忠明,任鑫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 [10] 纪莉.跨文化传播的情感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2021,2:1-7.
- [11] 王文静.译者序:人类视野中的情境学习//J.莱夫等.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王文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
- [12] S. Feuchtwang. Making Place: State Projects,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 London: UCL Press, 2004: 5.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The Practical Path to Cultural Meaning's Cros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Spread of “Grassland Complex” in Inner Mongolian Mixed Language Families as an Example

Wu Rihan (Wuhan University; Hohhot Minzu College)

Abstract: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in cross language situation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meaning.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path and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taking the spread of “grassland complex” in mixed language familie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s a case stud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ros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mong members of mixed language families, and found that cross language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life events and media practices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ultural meaning's cros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emotions contain cultural cognition and the values within culture,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is applicable not only to families, but also to a wider range of cros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Key words: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cultural meaning; cros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grassland complex;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2024-03-12

■作者单位:乌日罕,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新闻传媒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肖劲草